

709

709大抓捕三周年

一期一会

身陷囹圄的中国“维权律师”

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

大抓捕三周年

有所思

敢于说

“NO”

翻墙者第四期

编者的话

这个7月，注定多事。7.3日，海航董事长王健因意外在法国身亡，7.4日，湖南女孩董瑶琼在上海海航总部前直播了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的全过程，以此方式表达对习独裁专制的抗议，泼墨行为随即引发全国性地效仿，北京方面更是发布通知，要求撤下与习近平相关的所有标语。

当公众的视线被接二连三的突发新闻吸引，正在蒙难的维权律师群体却鲜有舆论关注，不少人更是对三年前那场“709”大抓捕一无所知。

三年过去了，当初被捕的律师里，相当一部分仍然身陷囹圄，他们秉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抛却宗教信仰的偏见，不在意社会身份等级之间的鸿沟，坚定不移地通过法律途径为那些被公权力欺凌的群争取公平的对待与保障。

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值得肯定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于是他们被抓捕，遭遇酷刑，被裹挟出现在电视新闻中“声泪俱下的认罪”...

时间一直在前进，可我们的法治和文明却正在倒退，当法律只是约束公民的工具却不能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时，当司法无法摆脱执政党控制时，当审判沦为执政者剥夺公民合法权利的手段时，法已然成为恶法，那么公民是否仍要守法？

在“709”三周年之际，我们也对中国的法治现状做了梳理与反思，希望能给各位以启发，愿大家共同努力，建设真正的法治中国。

《翻墙者》编委会

2018. 07. 29



我们欢迎各位意向参与到杂志编辑中的友人加入，也欢迎大家向《翻墙者》投稿

Twitter: @fanqiangzhe3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fanqiangguangbo>

Telegram Group:

<https://t.me/fanqiangzhe>

投稿请发送至：

editorfqz@protonmail.com

若您不便使用自己的私人邮箱进行投稿，您可登陆我们为您提供的公用邮箱进行投稿：

地址：writerfqz@protonmail.com

登陆密码：[buyaogaimima](#)

其他问题，请联系：

fqzofficial@protonmail.com



目录

新闻集

2018. 07. 03-07. 23 要闻回顾	1
--------------------------------	---

一期一会

司法不彰，何以谈权	3
恶之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5
黑暗中的正义行者：“司法良心” 张思之	9
许志永：《远方的四年》	12

有所思

从刘晓波到“709”律师：对公权力说“不”	25
离开梳妆打流氓离开梳妆打流氓：“709”律师太太团的这三年	27

故人言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32
中国政法大学2016届毕业生致辞：为法治而奋斗	37

目录

看电影

发条橙

.....

39

极客说

从现实的墙到无形的墙：一位程序员的翻墙感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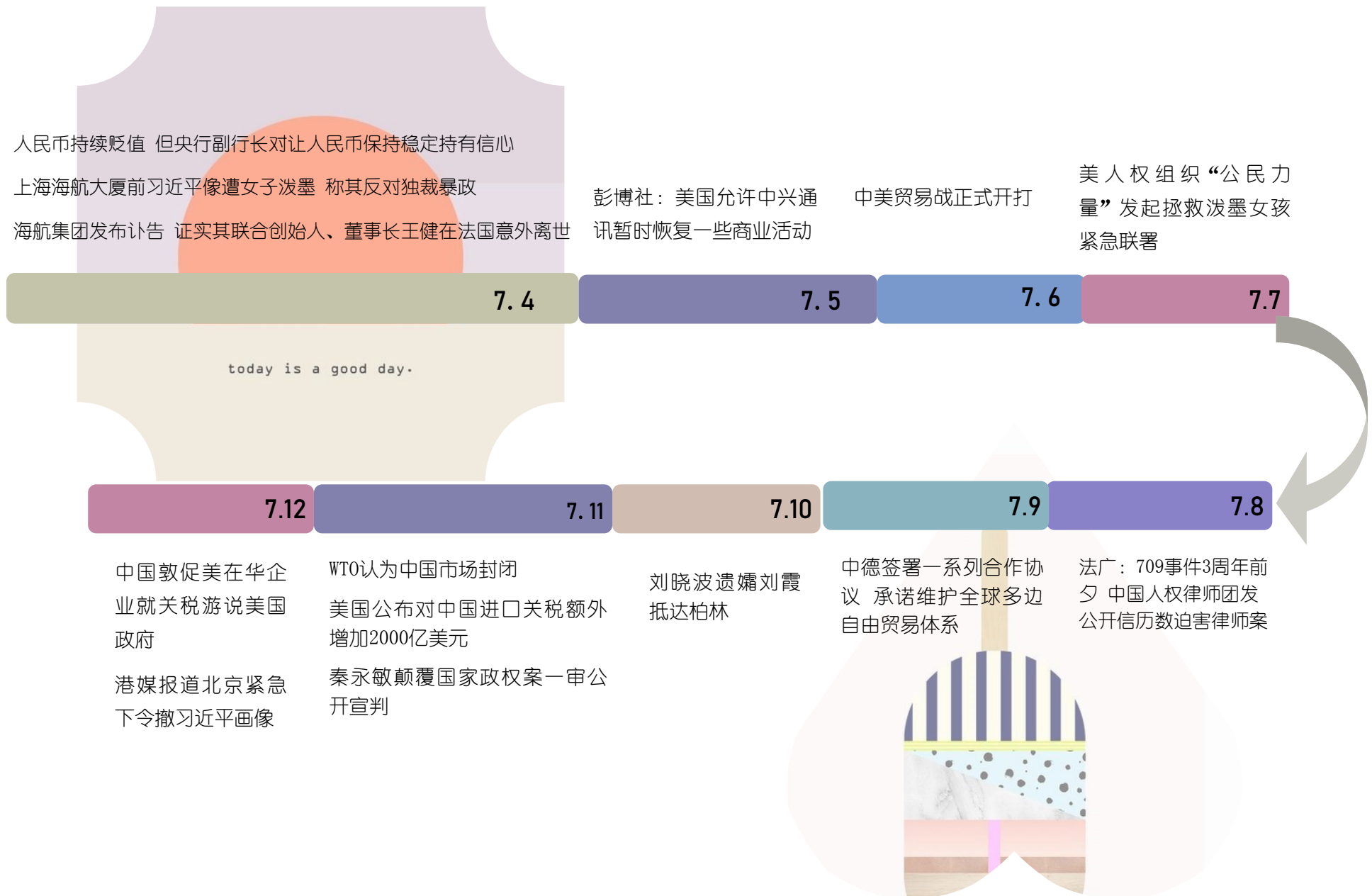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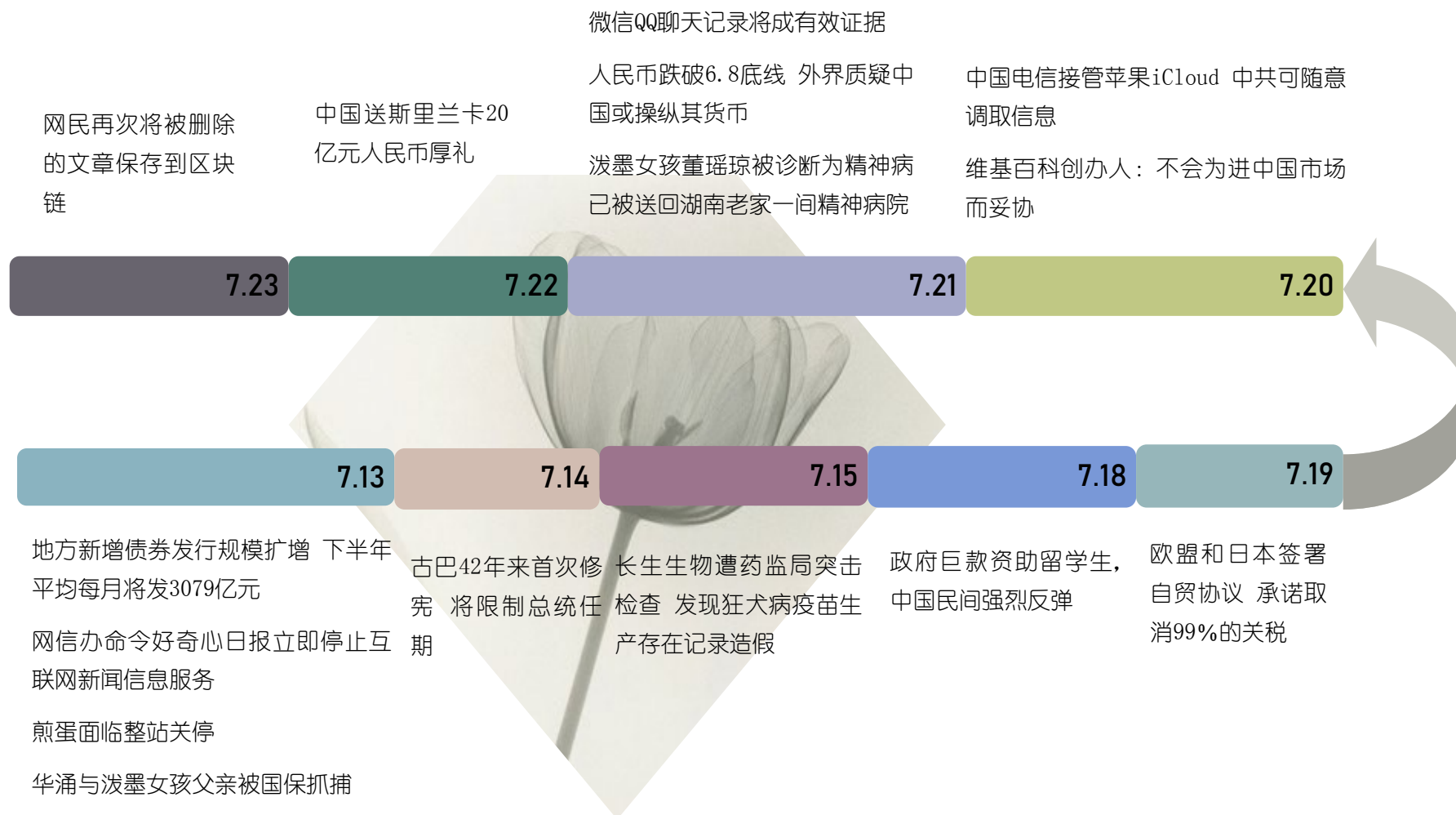
网络隐私安全小知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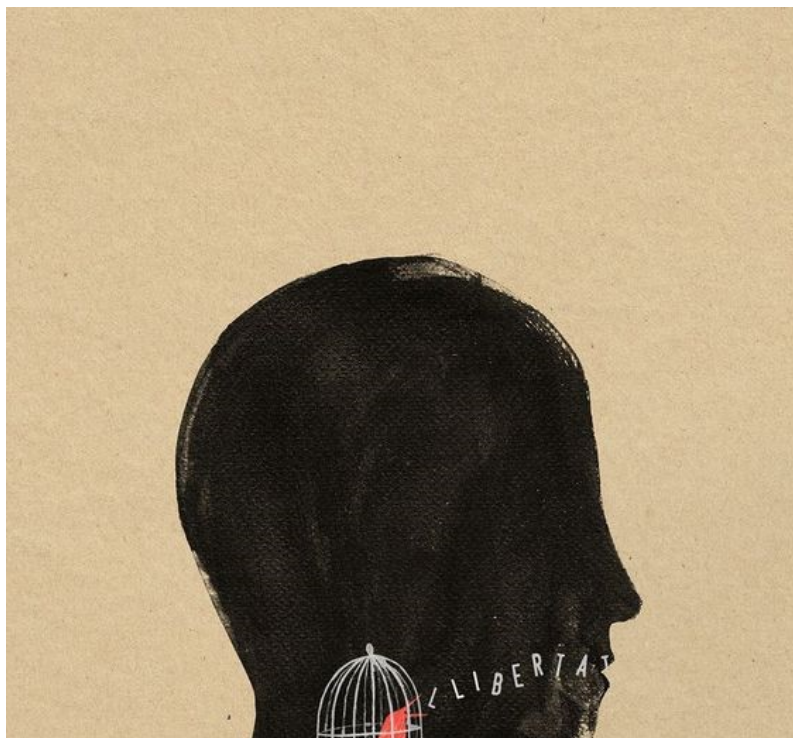
44







司法不彰，何以谈权



法治精神，是对自由、正义的肯定，对公俗良序的守护，对个体生而为人的尊重。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法治，这株原生于西方的幼苗，始终未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作为现代法治产物的律师，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尚未满10年之际，便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蒙难二十年。

尽管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司法体系的不独立，使得律师从一开始，就被公检法机关视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横加在司法程序中的异己监督力量。

千禧年伊始，经济的腾飞使得中国加入WTO的需要日益迫切，为了获得美国的首肯，中共开始在一些政策上妥协，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开始进入法律界，他们开始思考自由、宪政、个人权利的意义，开始寻找，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下，个人如何反抗来自政府不合理的压迫，新一代律师中，人权律师是看起来更为激进的群体，他们充满热诚、大胆敢言，也不惮以前辈们不敢采取的方式向政府发起挑战。人权律师把捍卫人的基本权利看作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一条坚守的价值底线，他们致力帮助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上访者、信仰者、弱势群体和异见人士，虽然人权个案的结果大多是失败的，但在这个很多政治和社会议题都属禁忌，就连某些种类的思想都被禁止的国度里，人权律师的崛起无疑是给人以希望的进展，来自民间的有力声援不断增多，共同谴责并抗议非法审判，终令作恶者有所忌惮和收敛。



但成功最终招致了打压，2013年8月，一份党内备忘录在网上被泄露。备忘录列出了“七不讲”，其中包括西方宪政，及其组成部分：“司法独立”、“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其所涉及的都是共产党寻求遏制的东西。2015年7月9日——也就是常说的“709”，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后，中国律师遭到的最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中国人权观察人士（纽约时报）估计，全国共计有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成为目标，其中27人被禁止离境，255人被暂时拘禁或强制审讯，28人遭政府羁押。这不只是对人权律师，也是对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与社会行动主义的一次打击。

2018年，是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20周年，但是于2017年出台的《监察法》草案，却为大规模侵犯人权埋下“有法可依”的祸根。

公权肆意违法，冤案接连不断。酷刑、虐待、被失踪，这些令人胆寒的词语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苦难愈深重，人权律师们却愈加坚定，作为捍卫人权的主体，他们在吴淦案、陈云飞案、黄琦案、秦永敏案等个案中更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历史责任。广东八位人权律师组成的湖南肺结核事件律师团是继“709”事件后首次协同出击，展现了捍卫人权的坚定信念。这不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的公民社会的努力，更是对**自由、公义、爱**的坚守。

恶之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身：反革命罪

法律的泛政治化，一直是中国法律中的突出现象。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惩治反革命罪的单行法规《反革命罪条例》，开“反革命”行为入罪化之先河。

武汉政府解体后，国共两党的法律有很大的调整，但反革命罪却被两党不约而同地继承了下来。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便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将《条例》升格为法律。中央苏区也于1931年制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反革命罪更是成了惩罚最严，打击最重的刑事罪名。直到1997年，在中国大陆“反革命罪”才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后，反革命的概念才从宪法中被剔除。

换汤不换药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废除了“反革命罪”，相应取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新确认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相应产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由于法治精神并未真正得到中共这个一手把持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尊重和遵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脉相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多少改进。



查看《刑法》原文可发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指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方式”这一概念宽泛模糊，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定罪量刑不清楚的问题。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传播自由等权利，但是刑法又规定了对言论、出版、信息传播的惩罚条款，法律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时，只笼统地说“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时候，不得侵犯他人权利和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至于什么情况算侵犯了他人权利，什么情况算危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则完全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这些标准都掌握在法官和他们身后的党的领导人手中。人治超越法治的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上述权利。

由于立法上的功利性和司法实践中的荒唐性，颠覆罪历来广受诟病，中国当局的立法者为了所谓“国家安全”，随意扩大“煽动颠覆”的解释空间，乃至违背词义本身的要求和人们的常识理性，导致立法上的逻辑笑话和司法上数不清的荒唐案例。

除了“因言获罪”外，“结社组党”也是中共当局的重点打击对象，即使中共作为中国目前的执政党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一效力大于国家内法的国家公法，但并不妨碍其在司法实践中屡屡作出与公约相违背的行为。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这是对结社权利的规定，也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剥夺的最为彻底最为严厉的权利。中国当局不仅对政治性团体、甚至对民间工会、农会以及文学读书会、宗教团体等都严厉取缔，以至于不管是否具体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只要参加了这类组织，一律视同颠覆行为，这就荒唐到了极点。实际上完全取消了结社权本身。【2】

最典型的当属新青年学会案，在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行为的情况下，因内部成员为北京国安所发展的眼线，将读书会每次讨论的内容悉数记录报告，北京国安依此内容，锻造成狱，最终读书会成员中两人重判八年，两人重判十年。新青年学会是真的意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还是中共对于结社的恐慌，从张思之律师为新青年几名被告的辩护陈词中不难窥探一二：

“几个青年草创了一个学会即“组织”，又曾在网上和5次聚会中发表了关于社情与国情的言论，此外别无行为或行动。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该学会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章程，因而还不能认为是一个正式的社团。第二，一个学会是否能构成对国家安全危害，应从其宗旨与会员构成和他们的言行中具体加以分析，方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考察“新青年学会”，是几个青年基于热情而成立的、以学习与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极其松散的小小团体的雏形，他们在成立之后总共有5次聚会，讨论关于社情、国情的学术性问题，目的在于“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而努力。振兴的提出，说明诸事待兴。而在这“待”与“振”的过程中必然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探索。

试以本案为例，宪法明定的结社自由不正需要人们去探索实现之道么？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不成对国家安全危害。第三，各会员即本案被告人的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也应从言者的动机、目的审慎考察，有些言论、有些思想观念，有人有权断为“反动”，但退万步说即使是“思想反动”，也还是思想性质的问题，毕竟同犯罪无关，按照政策，只能予以教育或者批判，决不该绳之以法，严予镇压。这是在研究本案的犯罪构成要件时必须把握的原则性界限，万万不能混淆或者偏离。一审判决的错误明显，恳请纠正，另作明断。【3】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众并没有享受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生活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49年后的中国，我们没有看到文明和进步，却遭受了频繁战争、饥荒、政治运动，和这些人祸带来的创伤。邓小平半遮半掩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仍在探究和摸索的道路上。

按照马克思原本的理论看，社会主义要求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个人尊严、完善的福利体系、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根据这样的定义，现今中国大陆存在的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人权不彰不是社会主义，环境破坏不是社会主义，道德沦丧更不是社会主义，当今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比资本主义更加恶劣的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政权一旦被某个主义绑架，思想就会僵化。政府的首要责任是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而不是让民众相信什么主义。美国四年一次的换届选举、2016年缅甸大选揭示了一个事实，“颠覆”国家政权不是罪，而是公民的权利，如果说异议人士们想推翻什么，与其说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说是想推翻一个反人类的现代奴隶制度。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被一群作恶的魔鬼把持，颠覆它不仅是每个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

【1】溯源反革命罪的存与废 侯欣一

<http://cul.sohu.com/20121126/n358682980.shtml>

【2】新青年学会资料 <https://netizensparliament.wordpress.com>

【3】《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黑暗中的正义行者：“司法良心”张思之

作为律师，张思之并不特别为公众所知，所办案件也多因敏感而少有公开，更难见于报端。他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1949年中共掌权后，年仅21岁的张思之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同仁们称其为“学生干部”。法院中留用了一些前政权法院的推事，正是这些推事，给了张思之了最初的法律启蒙，让他知道了法律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本质。在1957年的反右浪潮中，他被打成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随之而来的是十五年漫长的劳改生涯。结束劳改后，先生在北京市垂杨柳第二中学做起了语文教师。

1980年，张思之先生作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小组的负责人，再一次回到了阔别二十二年的司法界。对这个“政治任务”，司法部事先已对辩护定下调子：定性不能碰；事实不能碰，此种情况下，先生作为李作鹏的辩护人，仍据理力争，为他的当事人抹掉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一是另立中央，二是谋杀毛泽东。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律师职业的重航，也是他为“异端”辩护的开始。其时张思之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两案”结束后，上层有意安排张思之去司法部担任律师司长，可被先生婉拒。从此，他以职业律师的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

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多位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1991年的王军涛案、1992年的鲍彤案、1994年的高瑜案、1995年的魏京生案、曹海鑫案（1999年）、《南方周末》案（2000年）、新青年学会案（2001年）、阿安扎西活佛案（2002年）、刘荻案（2002年）、郑恩宠案（2003年）等，大都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案件，但张思之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全部司法过程，他以详实的证据、扎实的专业和缜密的逻辑，一次次地揭示了那些“钦定”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荒谬之处，凸现了党主司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96年，张思之将自己执业多年所写的辩护词，整理成一本书，名为《我的辩词与梦想》。这部集纳了他20年律师生涯的著作作为他赢得了北京汉语研究所授予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去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 2008年，张思之成为亚洲首个获得“佩特拉·凯利奖”的律师，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为捍卫普世人权、非暴力解决冲突以及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人物。

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去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

精彩缜密的辩护并未能改变终审结果，这也是张思之代理案件多数的结局。正如学者萧瀚所言，张思之所承办的案件几乎都是最高难度的案件，这种最高难度并不是体现在案情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体现在案件所处的现实背景。“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对于这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案件，张思之深知结果的无可更改，但仍以熊熊努力博取渺渺希望。他因此被喻为人权律师。对于人权，先生有着他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最不赞成把“生存权”突出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人权讲的是做人的权利，理所当然指的是人生存于世之后的那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就是人一样的生活，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有人认为十几亿人有饭吃，就证明人权状况良好，那么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了饭吃，得了“生存”，是否就有了“人权”？用不着再求“解放”了？，对于“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改善人权得慢慢来才行”这样的说法，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人权上授”观的典型反映，问题在于人权不是一种赐予，而是与生俱来、自然享有的权利，不容剥夺，谁违反了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也正是立宪的意义所在。



此外，张思之先生还对人权的内涵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即表达的权利，先生最欣赏罗斯福四大自由【1】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当下中国人尤其需要一种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公共生活看法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在强势的政府面前也能不卑不亢的生活姿态。然而先生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宪法中所规定的还有很大差距，一个人很可能因为无心的一句话而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当社会的稳定并非依靠公民的认同维系，而是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威权统治，这样的社会形态是非常可怕的。在一个公民无法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国度，是无法有真正的安居乐业，只能培养出寻租和投机的公民。

熟悉先生的人评价其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或许正是因为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民法泰斗”江平更是提出了“思之精神”的概念，他阐述这一精神内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正因为中国的司法现状常常令律师们绝望，才越发凸显张思之先生所坚守的希望。

先生的前半生，是中共定义的政治贱民，后半生，却是中国司法届的良心与希望，是保护人权和公义的行者思之。

【1】四大自由是1941年1月6日时，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该年度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他提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应该享有四项基本自由，分别是：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英语：Freedom from fear）

远方的四年

7.20日，于去年出狱的许志永博士在其博客发表长文《远方的四年》。作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许志永博士于2014年1月26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原文发表于：<http://xuzhiyong2009.blogspot.com/>

出狱一年了。朋友常问起那四年的生活。

恍若隔世。其实，此世亦然。

那是一个夏日早晨。三个月来第一次走出家门。市公安局的车送我陪妻子去医院产检。目送她去上班。

回到小区，楼前有警车和很多神秘的陌生人。楼梯口，接到“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刑事传唤通知。数十人进屋搜查。

已经失去自由三个月了。4月12日应邀赴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登机口被拦截。从此文保总队的人24小时守在楼道里，出门买菜都不行。4月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等相继被捕。两天前宋泽失踪了。我把未写完的《自由中国》发给笑蜀，做好入狱准备。

该来的总会来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只是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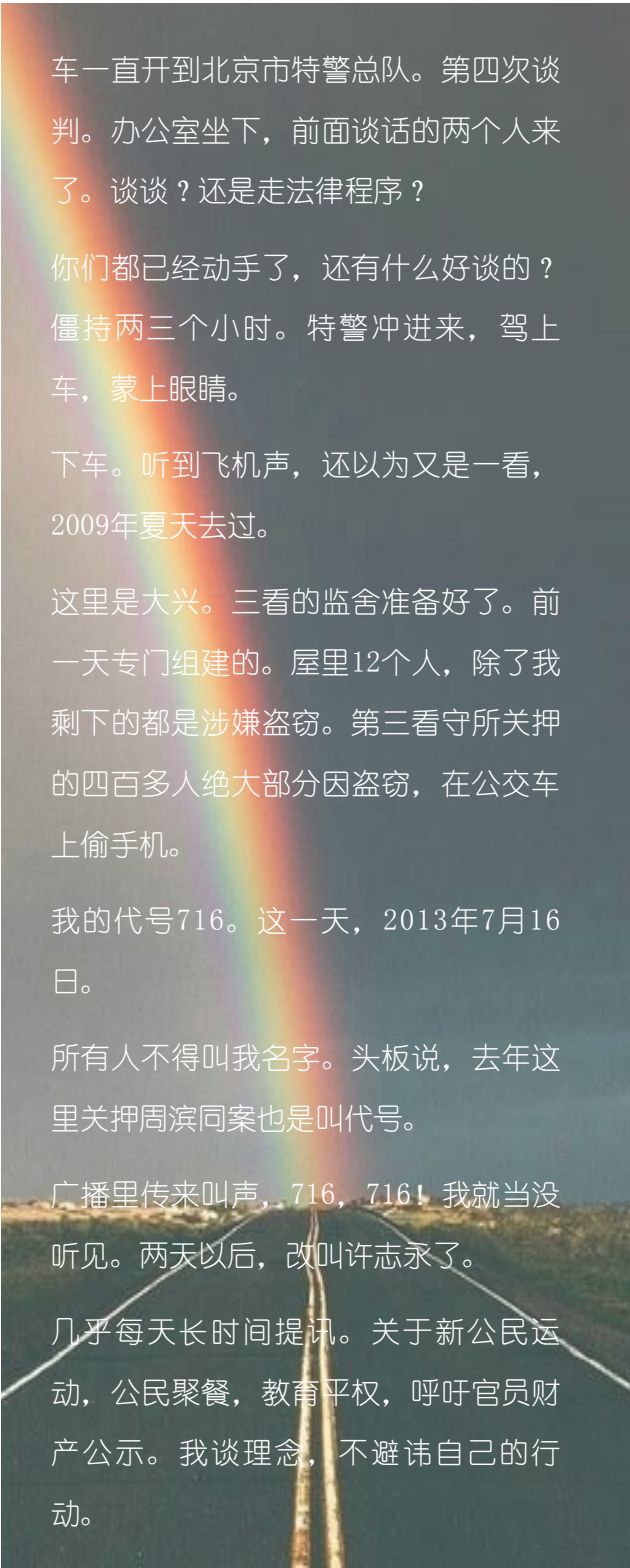
专制者真正在意的是新公民运动。“公民”徽章、头像，“自由、公义、爱”的核心价值，同一天20多个城市打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出现了政治反对派雏形。

5月以后有过三次“谈话”。小汤山附近农庄，自称北京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争论理念，劝我“认错”。意思很明确，投降就回家，不投降十年以上，不止一个罪名。

考虑到家人。我说可以停下工作，什么都不做。如果个别事情确实有错，可以认，我也常常反省。

错，怎么认？那得接受媒体采访。知道了，电视认罪，这是要我放弃使命。

这么多年，那么多和我一起努力，突然转头说，我错了？这是人格问题。我珍视自由，热爱生活，但在毁灭人格和身陷囹圄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既然无路可退，该来的就来吧。



车一直开到北京市特警总队。第四次谈判。办公室坐下，前面谈话的两个人来了。谈谈？还是走法律程序？

你们都已经动手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僵持两三个小时。特警冲进来，驾上车，蒙上眼睛。

下车。听到飞机声，还以为又是一看，2009年夏天去过。

这里是大兴。三看的监舍准备好了。前一天专门组建的。屋里12个人，除了我剩下的都是涉嫌盗窃。第三看守所关押的四百多人绝大部分因盗窃，在公交车上偷手机。

我的代号716。这一天，2013年7月16日。

所有人不得叫我名字。头板说，去年这里关押周滨同案也是叫代号。

广播里传来叫声，716，716！我就当没听见。两天以后，改叫许志永了。

几乎每天长时间提讯。关于新公民运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我谈理念，不避讳自己的行动。

涉及别人一个字不说。我回答，“不方便讲”。或者告诉书记员就记“沉默”。

教育平权“228”请愿，传单卡片是我去复印店印的。他们反复问复印店在哪。我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把复印店怎样，最多恐吓一下。

我不愿无辜的人受到骚扰和惊吓。不谈有关别人的信息是原则。我拒绝回答。铁椅子上，从早到晚，僵持六天。他们只好放弃。

问，王功权给了公盟多少钱。我回答，不方便讲。他都讲了你还有啥不能说的？我一个字也不讲。

一个字也不讲。我的话绝不可以成为任何人被定罪的证言。

这也是一点法律常识。他把现金给我，只有我俩知道。这事实不等于法律上的事实。法律事实需要至少两个人证言相互印证。一个人说了也白说，不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庆方出现在铁窗前，彼此会心地笑了。记忆中，是他在燕园讲座上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样子。北大法学院博士生他98级，我99级，我的学长。

他和胡育两位律师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沟通信息，对于政治案辩护非常非常重要。我着号服带手铐的演讲视频，他们也传出去了。预审为此气急败坏。

后来党国提升了无赖的高度，政治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王全璋三年不准律师会见。他们说，这是依法。可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恶法？

政治辩护，律师发声非常重要。无论当事人准备坐牢，还是妥协换取自由，外界广泛关注都是有价值的。至少，人在里面更安全。只在专制的法庭里面说，跟没说差不多。

即使要妥协，是当事人的妥协，不是家属和律师的妥协。家属和律师能做的，就是发声，讲故事，讲一个理想主义者怎样追求民主自由，怎样坚守理想，服务社会。

律师每次会见对外表达，那几乎是外界唯一的信息源。专制者最怕良心的力量传播。如果律师面临太大压力，可以讲给家属，家属再讲给网友和媒体。

李蔚在隔壁，有时一声问候。提审时通道里偶尔能看见201的家喜，宁静沉思。

放风有时听到“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呐喊，那应该是张宝成马新立他们。9月，知道功权也进来了。一天在通道里相遇。举起镣铐的双手，彼此抱拳。我告诉庆方，转告其他各位，能出去的就尽量出去，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坐牢。

看守所里最开心的一天，是步话机里传来宋泽取保的消息。后来从别的狱友得知，他出去时一头长发，看守所的监规从不合作。

11月初，最灰暗的时刻。

这天开始问《人民的国家》，美好中国的宪法构想。

2011年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众多宪法学者每两周讨论一次，持续五个月的研究成果。中国向何处去？宪法共识，中华民族太需要了。

律师不能会见了。这是对一个法律人暗示颠覆罪名。监舍原来的一些照顾，比如晚上不值班，取消了。

开始夜审。晚上快睡着时，提审。一直到天亮。也许接下来，很多天不能睡觉，酷刑的一种。我说如果明天还这样，我将彻底不合作。

人生有很多苦。监狱，从来不是意外。2004年买房时，目的很明确，出狱时，有一个地方住。可是十年，当它成为现实，那么漫长啊。无限的痛苦和伤感。

突然灵感闪现，一个声音说，快乐体验。2009年，第一看守所，也曾有过豁然光明的时刻。

那些创造历史的时刻。

快乐体验生命的所有。我爬起来，用小砂石在208的墙上写下“快乐体验”。

没有纸和笔——这大概是针对我的规矩，也写了不少字了。7月31日写下：“为自由、公义、爱，为众生幸福，为你的荣耀，主，我要在这世间活出你的样子。”

12月15日写下“漫漫自由路”。那天，曼德拉去世了。

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在引领我，驱使我。他总会在生命最灰暗的时刻闪现光明。他创造这世界。他是万物、生命、进化、人类、文明，一切终极的因。

第三个夜晚来了。气势汹汹。

刚出监舍就大叫“蹲下”，我一笑了之。嫌犯出门蹲下抱头是看守所的规矩。我从不合作。

提讯室里刚坐下，一个三十多岁的新面孔破口大骂。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人渣，畜生，败类……几乎所有侮辱的词都用尽了吧。一边走来走去，挥舞双臂，跺脚，用烟头猛砸，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好像马上要冲过来撕吃了我。

我双手铐在铁椅子上，安静地坐着。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吧，停了。安静下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问，表演完了么？

是真诚关心。这是谁，做了什么，为了谁？那些词怎么能，一个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能把那些词用在他身上？如果不是精神失常，除了表演还能怎么解释？

遥远的遥远的高处，看蔚蓝色星球之上，一个小小木偶摇来晃去声嘶力竭，挺可怜的。所以关心一下。

他一下子崩溃了。连说，唉，真对不起，我确实在表演，唉，这个活我真干不好！怎么安排我干这个活！

如果我有任何恐惧，或者被侮辱感，对方就赢了。什么办法有效，他们就会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于我，殴打只会提升灵性。在山东临沂，在青年宾馆黑监狱门口，野蛮暴力没有使我屈服。辱骂也没用。

后极权社会，意识形态丧失了。没有阶级仇恨。打人，只是一个饭碗，扮演一个角色。

历史长河中，我们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当超越尘世，在远方看地上的自己和世界，看人间各自命定的角色，还有谁是可怕的呢？唯有慈悲。

准酷刑就这么结束了。

12月15日电视播出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想起Beyond《光辉岁月》。一个民族的救赎，需要多少人承担代价。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是后来者。很幸运了。

2014年到了。灯光明亮的监舍，大通铺上各自入梦。耳畔响起那些遥远的钟声。童年的原野，春风拂过麦浪。纽海文的绿地，十字架指向蓝天白云。未名湖南岸，世纪跨年夜的呐喊。悠远的钟声，漫过时光之河青春岁月。

准备庭审。

如果讲法律，我们当然无罪。推动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只是公共表达，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堵路，没有拦车，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控方的证人都是警察或保安，且无一出庭作证。没有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是受害者。

党不讲法律，连程序也全然不顾。围绕并案与分案、证人出庭，律师激烈抗争。

新公民案显然是一个案件。我们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自由、公义、爱”的核心价值观，共同推动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示。指控我们的行为一样，用的是同一套案卷材料，没有任何道理分开审理。

唯一的解释是当局为缩小案件影响力，以无赖的非法的手段强行分案。

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再合理不过。但法官完全拒绝。

完全不讲程序，庭审已经没有任何正义的可能。

对这种完全走过场的所谓“审判”，我们只能以不合作表达抗议。我和律师商定，以彻底的沉默应对。

1月22日开庭。法院附近路口拉上了警戒线。那天很多朋友来到现场，还有很多朋友失去自由。谢谢你们！

张庆方和杨金柱两位律师简单说明必须沉默的理由，然后不再说话。无论法官怎么问，我们三个都保持沉默。

审判长叫嚷休庭。劝我说话。我懒得理会。

别的法官检察官都会私下说一句对不起，没办法，表达一下良心还在。只有他对我充满敌意。专制体制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了。

再开庭，还是沉默。无论法官、检察官说什么问什么，一概不理。审判长气急败坏，宣布再次休庭，威胁我和两位律师。

基本程序正义被践踏，我们又怎能配合？

接下来的庭审没意思了。检察官提出一个个“证据”，法官问被告人，有无异议？无人理睬。问律师有无异议，沉默。

他们都是一伙的，自己表演去吧。一度我打起了瞌睡。

下午四点，终于结束了。我的最后陈词时间，审判长数次打断。最后被迫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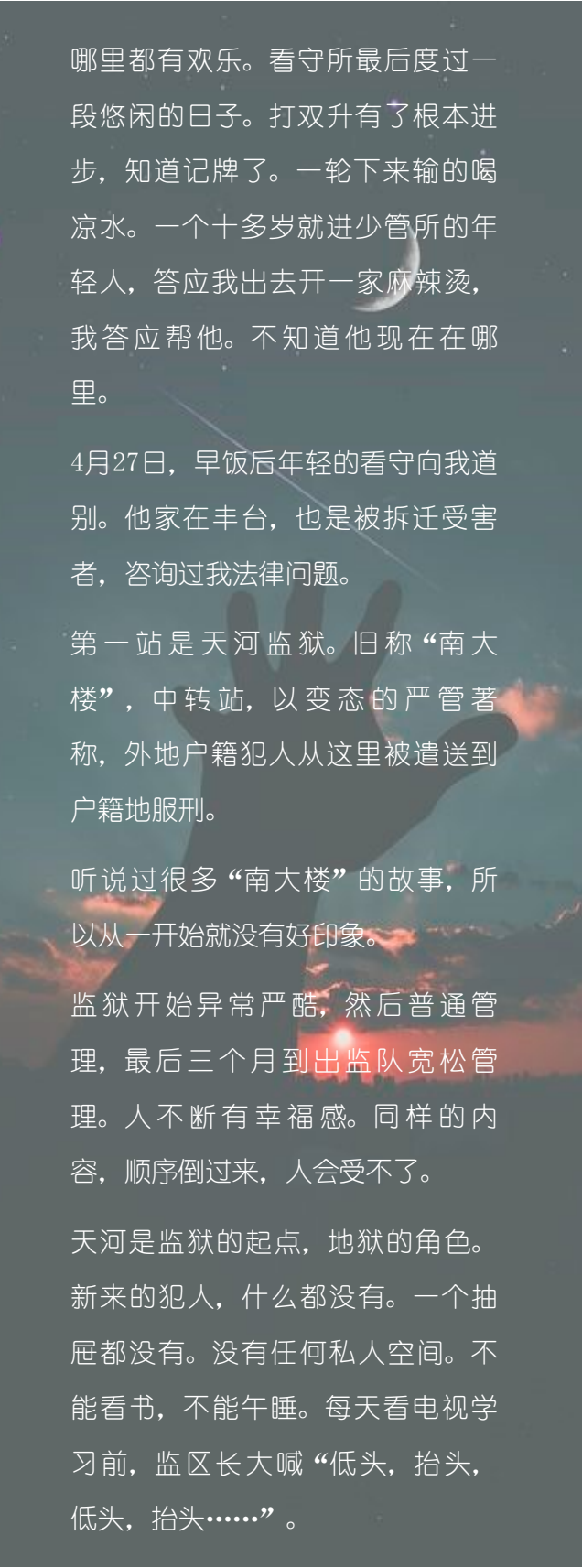
法庭上说什么不重要了，《为自由、公义、爱——法庭陈词》已经传播出去。

开庭那天她来了。女儿出生才九天。我跪下了。其实，我们这些信天命的人无所谓代价。代价是亲人承担的。一审四天后宣判。四年刑期不在意料之外。可是对于一个正在怀孕的妻子来说，还是太漫长了。

我们在上诉期最后一天提起上诉。不为改变结果，只为拉长战线，让更多人知道公民运动。

重大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但专制的法庭不是说理的地方。二审北京高院还是不开庭“审理”。他们害怕开庭。

宣判那天，我大声宣告：“荒诞判决阻挡不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共产专制的阴霾必将散去，自由、公义、爱的阳光必将普照中华！”一边被法警架出法庭。



哪里都有欢乐。看守所最后度过一段悠闲的日子。打双升有了根本进步，知道记牌了。一轮下来输的喝凉水。一个十多岁就进少管所的年轻人，答应我出去开一家麻辣烫，我答应帮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4月27日，早饭后年轻的看守向我道别。他家在丰台，也是被拆迁受害者，咨询过我法律问题。

第一站是天河监狱。旧称“南大楼”，中转站，以变态的严管著称，外地户籍犯人从这里被遣送到户籍地服刑。

听说过很多“南大楼”的故事，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印象。

监狱开始异常严酷，然后普通管理，最后三个月到出监队宽松管理。人不断有幸福感。同样的内容，顺序倒过来，人会受不了。

天河是监狱的起点，地狱的角色。新来的犯人，什么都没有。一个抽屉都没有。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能看书，不能午睡。每天看电视学习前，监区长大喊“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我必须抗争，为人权，也为自己以后的空间。

第一天因为在楼道里穿拖鞋，队长阻止，我说不服从。他大叫你敢写下来吗？拿纸来，我写上，不服从管理，签上名字。

这里有一个小图书室，是给留守的北京籍犯人看的。我去拿了一本书。队长要我送回去，我拒绝。他大喊班长，给他夺过来！我说谁要过来打架？班长是个瘦削的年轻人，北京地税局的，受贿罪，他很为难。书也就继续看了。

其实我知道，我抗争的力量，源自千千万万良心公民的关注。那是我的幸运，亦是民族的希望。和很多前辈相比，我是幸运的。

常常守望窗前。阳光下金色的苦菜花，闪闪不语的星星。布谷鸟彻夜呼唤，幸福，还有童年。

一个月的抗争结束了。5月30日，通知我收拾东西。调到哪个监狱，副监区长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聊过监狱中的特权。他说，我可能会被送到燕城。通常犯人会到二监再过渡两个月，然后分到各监狱。我希望尽快稳定下来。

警车上了高速公路。两旁麦田微黄。这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季节。白色的蘑菇，勤劳的蚂蚁，慌张的野兔一掠而过。那些遥远的时光。

车一直开到一座高墙电网的院子。看到“柳林监狱”，心说，我的龙场驿！

五百年后，我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远离尘世。

柳林监狱分七个监区，每个监区一百左右犯人，20多个警官。

我在的监区，指导员（一把手，后来改称监区长）人不错。他曾私下跟我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在我们警官心中，犯人分三类，第一类是你，原因就不说了。第二类是职务犯，社会大环境就这样。第三类是普通刑事犯。

几天后，他说，图书室准备好了。我们到监狱图书馆搬来了两百多本书。《诗经》、《论语》、《传习录》等传统文化经典，还有《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

我最珍视的，唯一收藏三年的，是一本《联邦党人文集》

16人住一间。抢劫、杀人、盗窃、贩毒、受贿等各种罪名的混住一起。一个小社会。本来心里狭隘的人多，聚在一起，生活环境恶劣，恶性循环。监狱里没有镜子。不准任何玻璃、竹签等可能伤人的东西存在，怕自伤自残。

起初一个月柳林的劳动是除草、翻地。把路两边的野草除掉，然后把土翻一遍又一遍。跟野草过不去，是监狱的变态之一，绝不允许任何自由生长的东西。

然后到大车间编椅子，给椅子架缠上塑料线。我不要积分减刑，劳动是象征性的，打扫点卫生，偶尔也编一个。

一开始给我的规定是，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劳动。我扫完地，在车间一个角落读书、思考。

学习期两个月过去了，指导员和监区长（二把手，后来改称教导员）把我叫出来，说，监狱规定，车间里不能看书。

我说，看书是底线。如果不让看书，我将彻底不合作，你们就把我送集训队好了。

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开始一天24小时被铁链子拴到床上。送集训队通常有一个仪式，开大会，厉声宣布违纪，警察高高架起胳膊，把头按到最低，匆匆押上车。文革批斗的架势。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无所谓，正好闭关修行。

指导员只好说，那就一次只能带一本书。几个月后在车间里看书时被督查发现了。监区长说，长点眼色。我说，我看书是公开的，绝不回避任何人。

窗外，黄昏。远处高铁飞驰而过。它连起了城市和生活。

巨大的白鸟翩然落入柳林。北方海岸就在不远处。很多年前遥远的大西北，听一个姐姐讲她的故事，冬天北方海岸的阴云寒风。1989年夏，流浪少年第一次来看大海，阴郁天空下，几艘大船，几只海鸥。一直陪她到深夜，头枕一本地图册，海风中睡着了。那是塘沽的海岸，就在不远处。

柳林待了不到5个月。深秋的10月22日，全体转监到垦华监狱。

垦华距柳林大约十公里。这一带有好几个监狱。这个叫茶淀的地方是北京在天津的一块飞地，据说周恩来选定这片荒野，用来关押国民党战犯。

垦华。名字就像我的故乡，民权。

垦华是新建的，不大，大概能容纳一千多人，实际关押六七百人。十个人住一间。绿化不如柳林。柳林有沙果林、枣树林、玉米地，到处是多年生的柳树。垦华道路两旁两排小树。空地上是大片的三叶草。

伙食最大的问题是单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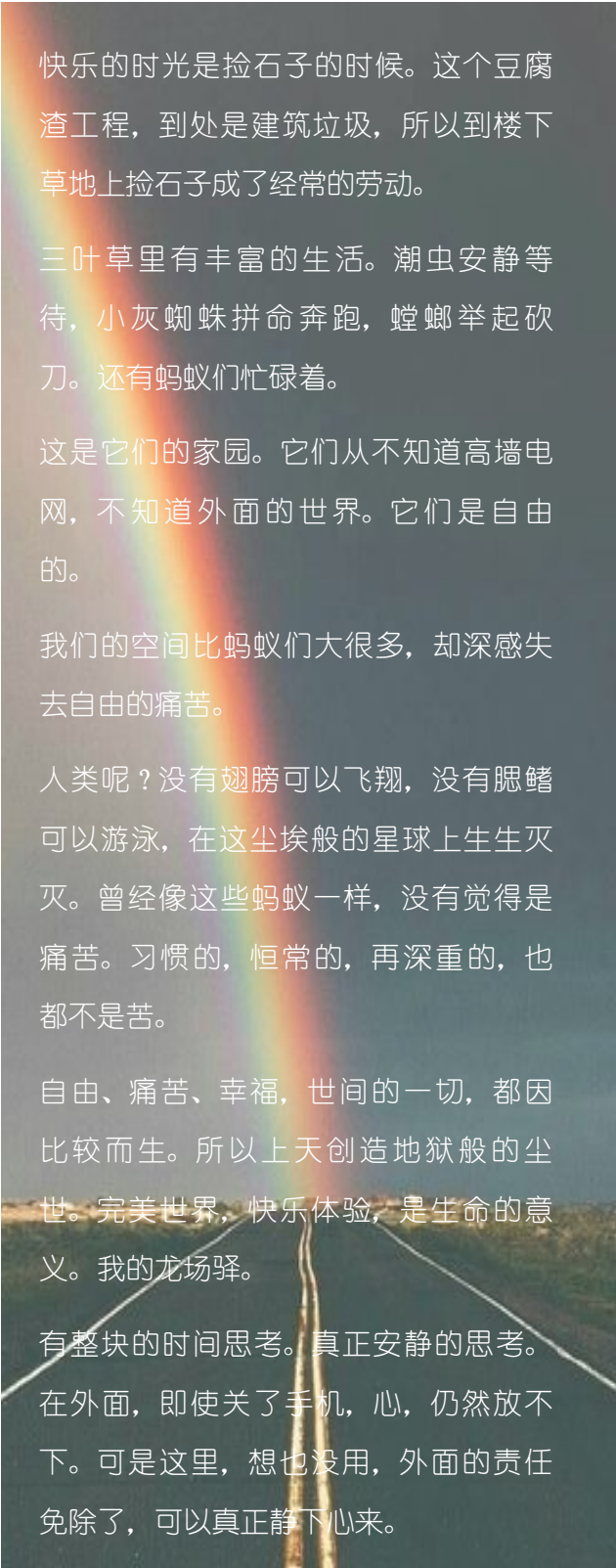
单看一个星期的食谱，还不错，早晚咸菜馒头，中午炒菜，周一白菜，周二茄子，周三土豆片……每周有两顿菜里有点肉，两顿米饭。但是一年到头就这一二十种菜，别的从来见不到。

每月可以填写订单采买，猪头肉、咸鸭蛋、水果等，但种类一年到头就那些。水果从来只有两种，苹果和橘子。其他无数种水果几年都没见过。能背着队长在地里拔一棵葱或萝卜，是莫大的奢侈。

所以一个桃子、一个香蕉可以作为劳动竞赛奖励。这群见过世面的人。

若夏日傍晚，与好友两三人，大排档几碟小菜，几瓶啤酒，该是多么奢侈的幸福啊。

这里没有生活。只剩诗，和远方了



快乐的时光是捡石子的时候。这个豆腐渣工程，到处是建筑垃圾，所以到楼下草地上捡石子成了经常的劳动。

三叶草里有丰富的生活。潮虫安静等待，小灰蜘蛛拼命奔跑，螳螂举起砍刀。还有蚂蚁们忙碌着。

这是它们的家园。它们从不知道高墙电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它们是自由的。

我们的空间比蚂蚁们大很多，却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

人类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没有腮鳍可以游泳，在这尘埃般的星球上生生灭灭。曾经像这些蚂蚁一样，没有觉得是痛苦。习惯的，恒常的，再深重的，也都不是苦。

自由、痛苦、幸福，世间的一切，都因比较而生。所以上天创造地狱般的尘世。完美世界，快乐体验，是生命的意义。我的龙场驿。

有整块的时间思考。真正安静的思考。在外面，即使关了手机，心，仍然放不下。可是这里，想也没用，外面的责任免除了，可以真正静下心来。

连续几天思考狭义相对论，连续几天思考时间是什么。我要知道这世界的真相，时间、空间、能量、质量、物质、生命、人类……。

其实准确说是感悟，安静等待，上天的启示。所有的灵光闪念都来自神，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自那终极的精神家园。

文明进步，是在更高处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认识神。

三百年来，认识自然，科学，迈出一大步，另一只脚，认知神，宗教，仍停在原地。

人是仰望星空的动物。总会追问生命的前生和来世，关心生命的意义，总在渴慕灵魂的皈依。

而过去的道路陈旧了。这是新文明时代。

我是幸运的。接收到那么多新知识。知道了世界的真相。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小心写出来，保存好。感恩上天，这神圣的使命。

我还有很多时间，思念。想你的时候，凝望窗外海棠花开，荒野绿意，又一个春天。想你时我走在队列里。仰望天空北飞的鸭群，它们要去远方筑巢。想你的时候，我轻轻摘下一片四叶草，想送你作生日礼物。想把生命中最好的，都给你。想你的时候，嘈杂车间一个小小角落，我在关心人类命运。这命定的修行之地，你总是一次次打扰到我，给我生活、幸福和盼望。

室友田树东做了腰间盘手术。他帮朋友讨债，抢劫罪，13年。曾和赵连海，结石宝宝的父亲，住一个监舍。

我和赖怀超、吴敏，还有几位，每天用担架抬着田去车间，下班抬回来。他俩都是职务犯。吴敏本科南京大学物理系，我常常找他探讨物理问题。

这个监区大约40%职务犯，有过六个正局级，高智商，可以一起探讨哲学。每个月会有新人，也会有人离开。有人离开时，所有人都会感到一点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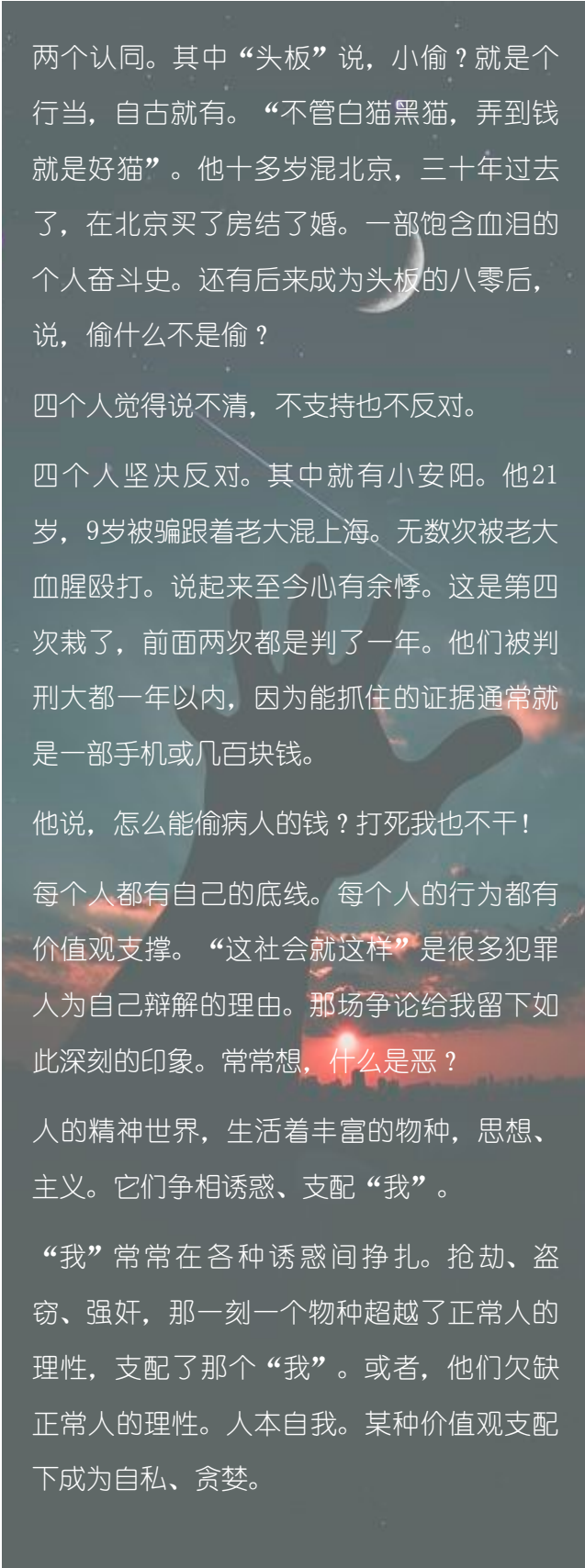
最后半年我们监舍八个人，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三个本科。几位职务犯，一个杀人犯，一个抢劫犯。其中老李住我下铺，国企总经理，贪污受贿20年，已经9年了，还剩9年，只减了两年，新政策来了，职务犯减刑停了，他患上了带状疱疹。

田树东在车间里躺在担架上。有一天教导员看见了，大叫，起来！我忍了再忍。有一天他让四个犯人高抬胳膊折磨一个精神病人，我也是忍了再忍。因为有重要的工作还没完成。

2016年6月，一场大暴雨之后，夜晚通道里呕吐声此起彼伏。我也肚子疼，属于轻微的。我粗略统计，40人上吐下泻，发烧，有肚子疼等症状的达到80%。整个监狱，估计超过四百人集体食物中毒。我们排除了各种可能，结论是很可能饮用水出了问题。几天后大会上，副监狱长说到此次事故，轻描淡写，要大家注意个人卫生。这里才是真正的敢怒不敢言。

这命定的修行之地。常常想，人性是什么？想起了看守所的那场争论。

室友们激烈争论可不可以偷医院。他们主要在地铁里偷手机，一个黄金周大概会有五到八万元的收入。有的主要偷商场。还有的偷医院里的病人。



两个认同。其中“头板”说，小偷？就是个行当，自古就有。“不管白猫黑猫，弄到钱就是好猫”。他十多岁混北京，三十年过去了，在北京买了房结了婚。一部饱含血泪的个人奋斗史。还有后来成为头板的八零后，说，偷什么不是偷？

四个人觉得说不清，不支持也不反对。

四个人坚决反对。其中就有小安阳。他21岁，9岁被骗跟着老大混上海。无数次被老大血腥殴打。说起来至今心有余悸。这是第四次栽了，前面两次都是判了一年。他们被判刑大都一年以内，因为能抓住的证据通常就是一部手机或几百块钱。

他说，怎么能偷病人的钱？打死我也不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价值观支撑。“这社会就这样”是很多犯罪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那场争论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常常想，什么是恶？

人的精神世界，生活着丰富的物种，思想、主义。它们争相诱惑、支配“我”。

“我”常常在各种诱惑间挣扎。抢劫、盗窃、强奸，那一刻一个物种超越了正常人的理性，支配了那个“我”。或者，他们欠缺正常人的理性。人本自我。某种价值观支配下成为自私、贪婪。

人性本善。不会为恶的目的做事。作恶，是受某个物种支配。坏人，其实是病人。所以文明的刑罚，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救赎。新文明没有仇恨，无论历史多么悲伤。

人都是有良心的。所以我总是那么乐观。相信人性。相信良心的力量。即使黎明之前，我们的灵魂深处依然阳光明媚。我们被恩典的力量无比强大，改造国民性，创造历史。

2017年春节。这里的最后一个新年。每逢佳节。监舍里挂上气球、彩带，淡淡忧郁中度过欢乐的节日。七天假，三天半教育、升旗等，剩下的可以打牌、下棋、看电视。大家最关心的，是伙食改善，每天两顿炒菜，有肉，初一和初五，两顿饺子。

漫长的时间被节日分割开来。冬天和春天好过。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节，一个一个的盼望。夏天最难过，很长时间没有节日，酷热，烦躁。每年夏季三个月的主题是“平安度夏”。

外面繁华世界，有时落叶飘在头上才想起秋天。而这里，窄小的窗口，透过粗大的窗棱，你能清晰看见，时光的河流，缓缓流过。海棠花开了，结果了，叶落了，下雪了。海棠花开了。

想起1987年元旦，煤油灯下书声朗朗，窗外大雪簌簌落下。少年在日记本上写下一生的梦想。三十年了。

这漫长的路。通往自由的中国，美好的中国。

我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是理念有变。只是之前一直对人抱有幻想，不是相信谁，是自己被生活诱惑，不想肩负起这古老的民族。看了三年新闻联播之后，一个声音说，别再逃避了，你的天命。

在哪里都是工作。在哪里都是修行。忙碌了三年，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手

写20多万字，抄两遍。直到临出狱两个月才完成使命。长长舒了一口气。

把《联邦党人文集》再认真研读一遍，交回图书室。又读了《圣经》、《古兰经》和一些佛教、道教著作。思考公民运动，政治文明转型，我的美好中国。

塞北，江南，昆仑，东海。五千年日出东方。辽阔的美丽的沧桑的土地。我是你的孩子，中国，苦难忧患属于我，光荣骄傲属于我。

诚实公道善良的民族，托起新文明。完美世界，荣耀昊天。自由、公义、爱，美好中国。自由，公义，爱，美好中国。

2017年7月15日零点整，监区长热情地叫醒我，快走快走，回家。我说，笔记本呢？之前交给他们审查。到门口再说。我还是上当了，出了大门，要我的九个笔记本，不给，连个收条也不打。僵持近两小时，算了。很多朋友在等我，有的越过重重障碍到了监狱附近。谢谢你们！

我回来了，中国。

公民 许志永2018.7



从刘晓波到“709”律师：对公权力说“不”

作为一个理科生，但是对历史却很感兴趣。老师曾经很模糊的提及过89事件，他自己也是个参与者。给人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游行活动，并且以非常血腥的方式结束。百度所给出的答案也并不让人满意。直到高中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网络确切来讲是个局域网。而这扇大门所导向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新奇的，透过这扇大门，我知道了有时候活的清醒也是一种罪，以前我从不相信信仰，或许现在我要重新考虑一下。第一次我得知中国竟然不止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时候屠呦呦还没有得奖。不过这位诺奖得主并不受中国政府待见，甚至被列为头号敌人，理所当然的在中共为其准备的监狱里，就像诺奖得主卡尔冯奥希茨基一样被关在纳粹的监狱里。不过相对于刘晓波，其命运更好，纳粹当年出于国际舆论考虑，在其生命快结束的时光之前释放了他。并允许诺奖委员会到其家中为其授奖。而刘晓波至死都没有被释放，甚至其家属刘霞都长时间被监控，即使在刘死后也是如此。对于某政府这种野蛮以及残忍的行径，那一年那张空凳子表达了人们对其无声的抗议。刘的行为本没有任何问题，错的是他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做了一件正常的事情。或许他就是朝廷口中的不自量力，螳臂当车者。



已故的刘晓波先生，被抓捕的“709”律师们，用不同的方式，在对公权力说“不”，他们用行动的语言，告诉人们，公民有对执政者说“不”的权力，合理正当，天经地义。



他试图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呼吁一个冷血的和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政府去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可是他们早已声明他们不走西方的邪路，他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在他们眼里国情论是解释所有问题的万精油，就如《走向共和》中的经典台词一般“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他终于死了，死在了在共党看来可笑而又或许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信仰的路上。他本可以像他的同僚一样出国免受牢狱之灾，但是他拒绝了，他进了牢还要向世界表明他没有敌人，自然有人不理解甚至去批判他，你怎么能没有敌人呢。即使在他死后，有些人依旧如临大敌，匆匆火化，甚至连骨灰都恐惧，只能洒到海里让人们无从纪念。



如果说中国政府一直宣称其是实施依法治国，那么709案人们就应该认清其丑恶嘴脸，没有出示拘捕令就强制抓捕，半夜十几二十个警察破门而入，法院没有审判就强制电视认罪，被抓的维权律师不能会见家属也不能会见律师。强制失踪的典型我们不得不提及王全璋律师，其被强制失踪了长达3年之久，其妻子李文足四处寻访不得下落，令人感慨，这和当年纳粹突袭犹太区有何区别，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21世纪。这次抓捕行动多达23省份，几百名维权律师被约谈，逮捕。官媒竟然将这次行动是依法治国的必要进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看来这个社会的黑白不是普通，也不是平常。我们也许不久就会见证当高压锅上所有的排气孔都被堵死之后所要面对的场景。现在还能看到华涌这类的人，他们还愿意为自己的良心以及这个国家付出点什么，可是就如鲁迅笔下所写的，中国人大多都是看客。我们对同胞的麻木有时候都让很多人怀疑我们能叫作人吗。我们有着最勤劳的双手，但是似乎也有着最麻木的灵魂。



新时代的人，愿你我不再冷血，认清前方的路，不再被谎言所蒙蔽，今天他人所遭到的不公，不要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有明确的拒绝，并争取自己所要求的权利，才有可能在这边土地上构建一个现代良序社会。



离开梳妆打流氓：“709”律师太太团的这三年



By 巴丢草 Twitter: @badiucao

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波伏娃

709律师大抓捕过去了三年，每一个被抓捕的律师名字身后，都有一个艰难挣扎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家庭。作为709律师的妻子，她们承受了巨大的现实压力和精神困扰：丈夫深陷牢狱，甚至了无音讯，失去经济来源，成长中孩子没有父亲的陪伴，还要跟随着母亲担惊受怕四处奔波。她们不断抗争，为了她们受到不公待遇的另一半，也为了丈夫所坚信的事业。在媒体上，她们的名字总是和她们的丈夫联系在一起，仿佛是被被动地承担了这份不幸，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她们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与其说是这种命运选择了她们，不如说是她们主动选择了这种命运。

李文足

“除了妻子，妈妈，我还是李文足。”

作为709太太团里最出名而又最不幸的成员，她在2015年7月10号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简单而又平淡的生活，在她的丈夫王全璋，一个专门代理法轮功案件的律师被抓走之后，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三年内丈夫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她从一个只追求过好自己小日子的小城女生，迅速成长为站在中国民主运动前线的活动家。

在这之前，她不爱说话，不爱抛头露面，对和公检法打交道有着普通民众自带的恐惧，她只是一个妻子和妈妈，一个出门前必须吹头发的爱美年轻女性，虽然和丈夫聚少离多，却也算岁月静好，她曾经注册过微博，了解过丈夫的事业，却又被社会的黑暗所吓退，删除了微博账号，抱着侥幸，觉得只要自己不去看不去关心，这些恐怖就会离自己很遥远。709向她展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她并没有选择远离恐怖的权利。

三年里，她被监控，被软禁，被骚扰，被逼迁，遇到了无数的敌意，冷漠和攻击，长期活在对政府迫害的恐惧和对丈夫命运不确定的惊恐中。丈夫刚被抓走的那几个月里，她天天哭，只知道哭，哭了六个月，丈夫还是没回来，于是她擦干眼泪，联系上了其他709律师的家属，开始一起出去找她们的丈夫。

709之前，她只是各种演讲的听众，2017年却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视频作证，侃侃而谈中国政府对她丈夫的非法拘禁和迫害，让709律师的遭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她和其他709家属徒步百里从北京游行到天津，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709律师事件。其他人的丈夫都有了下落，而王全璋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她并没有放弃，2018年五月，在默克尔访华期间，她向默克尔面呈信件，恳请代查丈夫的下落。终于在丈夫消失三年之后，为他争取到了第一次见律师的机会。



2016年6月6日，李文足（前）与其他709家属在天津市看守所前抗议。

王峭岭

“我会亲自当我先生的辩护人”

在709太太团里，王峭岭是公认“最有文化”的那个，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同为法律专业毕业，有律师资格，普通话标准，能言善语，最初太太团的口号“离开书房打流氓”就是她提出来的，后来李文足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离开的是梳妆台，才改成了“离开梳妆打流氓”。她的丈夫李和平常年为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拆迁受害者，法轮功和弱势群体等维权，是著名的“宪法至上，信仰无罪”辩护词的发表者之一，这给予了王峭岭足够的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他在2015年7月10日被抓捕后，王峭岭迅速做出了反应，她7月底就向带走丈夫的天津市公安局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丈夫的罪名和现况。8月3日起诉新华社、人民日报等9家媒体对李和平污名化和混淆视听的报道。8月6日因连续发表多篇有关李和平的文章，而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在派出所传唤5小时。12月份李和平被天津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她迅速为他聘请了辩护律师，但辩护律师无法会见李和平，而后又因受到政府的压力而无法进行有效辩护，她挺身而出，宣布自己会亲自担任丈夫的辩护人，拒绝当局为李和平强行安排的官方代理律师。



王峭岭 Twitter 头像

在“709”家属的6位家庭主妇中，王峭岭也常被认为是最“勇猛”的一个。她写很多关于李和平的文章，不断到相关部门控诉，持续曝光“709案”抗争中遭遇的种种不合理对待，几乎每一个太太团的活动里都有她的身影。她脾气并不如李文足般温婉，当她在2017年4月28日获知李和平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三年缓四年，“去他妈的缓刑”，王峭岭愤怒而掷地有声地说：“怒火烧遍了我的全身。我恨不得立即拥有把这些杂碎们骂得躺进医院太平间的超能力！”当她的丈夫被释放返家之后，她并没有就此停止，她不断地向外界叙述她丈夫在两年内受到的酷刑，继续积极参加为709律师发声的活动。在709大抓捕三周年之际，她还组织了709家属感恩之行，先后给曾为他们亲人进行法律代理，结果自己也失去了自由的法律工作者李昱涵、余文生、江天勇等人存钱存物，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刘二敏

“如果他不能发声，只能吃饭睡觉，这有什么意义？这跟死有什么区别？”

刘二敏认识翟岩民的时候，两个人都和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结婚后五年都在经营一个小小的饺子馆，后来翟岩民又开了六年的出租车，两人的生活一直十分拮据。后来翟岩民投入人权活动，帮助访民维权，再后来加入了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一个代理访民、许多弱势族群、法轮功无罪辩护案件等当局眼中的敏感案件的律所。这个决定让他变成了709大抓捕中的“提前批”。

刘二敏文化程度不高，2016年初，她第一次跟其他家属一起去天津检察院控告时，刘二敏有些尴尬，因为她不太会手写字，尽管平时在手机上用拼音打字她是没问题的，后来王峭岭主动为她填写了控告表格。由于背景的差异，以及翟岩民90多岁的老父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照顾，刘二敏很长时间较少跟其他家属一同行动，但她一直相当认可王峭岭和李文足等人。在6月8日的送检期限前夕，原先在住地国保的威逼哄诱下有所妥协的刘二敏，经过其他家属的反复说明和动员，下了决心要“豁出去”。于是她与王峭岭和李文足一起在天津检察院第二分院门前上演了著名的“红桶秀”，三人也一同被派出所带走。然而不同于王峭岭和李文足在羁押24小时后被释放，刘二敏在当晚被住地国保“领回”北京，并在派出所内遭到殴打，第二天早晨才放回家。王峭岭和李文足闻讯赶往看望，两人看见她身上一块块青紫，她们决定今后家属的行动必须同进同退，不能让任何人落单。其他人原有些担心刘二敏经此一役会被吓退，而她则明确地回应：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刘二敏向王峭岭说起，在派出所里被打后，她向警察强调他们有枪，而她这个“傻媳妇”没有。说到这里，刘二敏突然停了下来，压低声音、放慢语速，把头贴近王峭岭说：“其实我们有枪。”她拿起自己的手机，小声但郑重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枪。”王峭岭事后对这个细节极为印象深刻。长时间以来，她们在奔波中用手机发消息、发照片、接受采访、彼此联系，“我感受到但说不出的东西，二敏姐用那么简单的话就总结出来了。”她对刘二敏潜藏的敏锐啧啧惊叹。接下来两天，刘二敏、王峭岭和李文足又用手机拍摄了一系列搞笑小视频，讽刺警方的荒谬行为。[1]



709家属们的合影，第一张
左三为刘二敏



翟岩民是709律师中第一个被正式判刑的，2016年8月2日，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对刘二敏算一件好事，因为总算石头落地，判了缓刑之后，丈夫就可以回家了。然而与王峭岭相同，她的行动并没有结束，她一直陪着李文足，不断到最高司法机关控告，游行。这已经不仅仅关于她的丈夫，也不仅仅关于她的家庭。

709律师太太团里还有丈夫被抓走的第二天即发现自己怀孕，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小孩为丈夫奔走的原姗姗，原为大学教授却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流亡美国的陈桂秋，被抄家后只剩100元却要维持全家五口人生计的樊丽丽，还有更多的因为709律师抓捕而顿时陷入困境的家庭。中国政府为了对付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严厉打压维权律师及其助手，同时也对本应受到社会保护的女人和孩子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女人们成为反抗不公的呐喊者。事实上，709女人们的遭遇在中国并非偶然，右派的妻子们、天安门母亲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她们的丈夫被捕之前，她们普遍对自己的丈夫的工作知之甚少，对中国的现状并不关心，而在709之后，她们被逼站上舞台，却用对爱的坚守和对公义的担当变成了中国公民运动中一股新的中坚力量。她们不仅仅关心709律师，还关心其他公共事件的受害群体，如2016年的毒疫苗受害者，和其他的政治案件受害者。她们觉得，709大抓捕颠覆了她们的生活，却也成就了她们，让她们变成了有用的人。

参考

[1] 《从受难者到行动者》，赵思乐，端传媒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刘晓波

2017年7月13日，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因肝癌去世。

纵观刘晓波先生的一生，多半是在囚禁中度过，可他仍然保持了乐观平和的心境，他牺牲自己的自由，是为了唤醒更多人的意识，加入到“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来，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宪政与法治。

“公民不服从”或“良知不服从”，尽管源于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圣徒为信仰殉难的人格激励，来自教徒良知对世俗王权的徒手反抗（良知的权利），但作为一种世俗化公民运动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

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公民社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抗，是民间良知以公开违法的行动来诉诸于社会多数的正义感，它所违反的对象是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对制度非正义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征：

1、它基于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区别于公共领域的

道德相对主义。

2、它的反抗诉诸于公开性而区别于反抗的秘密性；
3、它的反抗坚持非暴力性而区别于反抗的暴力性。
4、它的反抗既是基于良知对普遍正义的关注而选择的自愿违法行为，又是对法治秩序的忠诚，承认公民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已经成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典范；之后又有由曼德拉和图图主教领导的反抗种

族隔离政策的非暴力反抗。然而，关于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适用于独裁国家的问题，西方学者则抱有怀疑。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专门论

及“公民不服从”，他也是从良知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定义“公民不服从”。

他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改变，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同时，

罗尔斯指出了“公民不服从”的两大条件——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识。公民不服从的制度前提必须具有最低制度正义的民主国家，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国民大致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对该国宪法合法性具有基本共识。换言之，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或立宪民主政体，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

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更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并不能涵盖其他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不可否认，甘地、金博士和曼德拉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所处的文化及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南非白人政府，毕竟是符合政治美德的自由政府，也是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治下，特别是在暴虐的独裁制度之下，非暴力反抗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而获得成功的概率则大大降低，即便能够成功，其过程也会极为艰难、曲折、漫长，所以，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问题。

也就是说，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反抗的一方，必须具有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而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直面自我罪恶的超常勇气，一种自觉不义的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一方是正义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义的忏悔者，反抗的良知

能够唤醒赎罪的良知——我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受害者的质疑和反抗能够逼出我的赎罪良知，让我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不得不向受害者忏悔。否则的话，非暴力反抗等于对牛弹琴，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比如，犹太人再有非暴力反抗的勇气、良知和韧性，也无法软化希

特勒的铁石心肠；在共产极权之下，“阶级敌人们”无论具有多么坚韧的承受迫害的能力，也无法唤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暴君的悔罪良知。

所以，在经过了六四大屠杀的当下中国，一方面是民间维权运动对“公民不服从”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现实可行性的置疑：¹，在独裁权力依然强大而公民社会极端脆弱的力量

对比中，民间的非暴力反抗对瓦解独裁权力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²，在政治权力毫无政治良知的制度环境下，只有正义的殉道者而没有不义的忏悔者，即便民间维权拿出再多良知，也无法唤起为政者的政治良知。

的确，现代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制度，极权国家的公民不服从，对如此暴虐统治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难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并非全无可可能。在共产极权国家，良知不服从运动主要是追求自由的人们反抗奴役的民间运动，主要表现为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在前苏联，索尔忍尼琴向苏联人民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捷克，领导“七七宪章运动”的哈维尔，号召捷克人民“活在真实中”，行使“无权者的权利”；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就是“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即便在军人独裁的缅甸，民间反对运动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

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持之以恒，前苏东极权帝国不可能在瞬间坍塌，昂山素季也不会得到世界最高的道义奖励——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由于长期的皇权主义老传统，更由于毛泽东极权主义新传统，独裁政权的强大与人性堕落的几乎同步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现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狼对狼的斗争哲学，毫无阻碍地转化为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犬儒哲学。由政权及其高官的示范、通过富豪和知识精英的普及的道德荒芜，几乎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社会名流的大面积逃亡，以及民主墙一代精英的被迫流亡，致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没有产生出像沙哈罗夫、索尔任尼琴、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昂山素季那样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运动领袖。

然而，这样的缺憾只能说明中国民间的过去和现在，未必就是中国民间争取自由运动的宿命。事实是，即便在异常残暴的毛泽东时代，也出现过林雁、方励之等一大批民间良知；在八九运动和惨烈的六四血案中，不仅造就涌现出一批学运领袖及其“黑手”，更涌现出无数不知名的民间英雄，只身阻挡坦克铁龙的青年，代表了冒着巨大生命危险而参与堵军车、救死扶伤、劝阻戒严部队开枪的无数清醒反思，仍然是今日中国民间维权的宝贵精神资源；同时，八九运动造就了中共党魁中的普通人；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格奇迹赵紫阳先生，也造就一批与中共体制决裂的党内精英，至今留在国内的鲍彤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就是这些决裂者的代表。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也出现过刘宾



六四后，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天安门”运动，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母亲”，堪称最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民间发起的“公开信运动”到新世纪的道义象征，也是践行“公民不服从”的网络维权运动，参与其中的体制外持不典范：“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同政见者代不乏人，使大陆的持不同政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逐渐公开化；自由知识界也形成运动的代表；从失业工人发起的“辽阳”了老中青三代的接续，体制内异见者也工潮”到利益受损的农民发起的“汉源”由老资格的离休高官发展为现职的中青事件”，还有市民们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人士。

心而自发形成“万州事件”等大规模群体性官民冲突，见证着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维权运动的日益普及和持续不断；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的良知不服

以上各阶层的非暴力反抗都在为大陆民间资源的积累作出各自的贡献，分散的民间良知不服从运动也在为日后的组织化积累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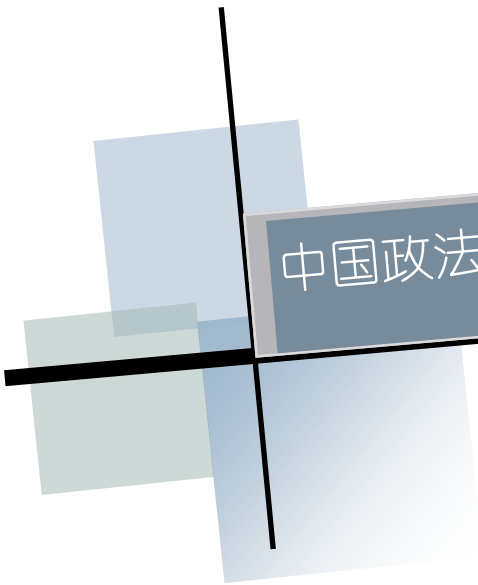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新兴自由国家，大都经历过民间的自发非暴力反抗运动，特别是在苏东巨变开启的后冷战世界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目标，为独裁制度下心向自由的人们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支持，其成功率也较之冷战时代大为增加。

首先，从人性进化的角度看，由于人性本身的逐渐文明化使自由不断扩展，自由的不断扩展又反过来不断提升人性的文明程度。当君子也把小人看作具有良知、只不过其良知被暂时遮蔽之时，也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恻隐之心，起码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狰狞面目，而包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

其次，从制度进化的角度看，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的世界性胜利，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都具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优势，为独裁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日益强大的国际支持；已经民主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加，昔日的极权国家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顽固的极权暴政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数独裁制度不得不“伪善”，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独裁制度的政客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不得不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说辞来装点门面。也就是说，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

再次，独裁国家内的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程度日渐提高，而独裁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则大规模流失，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谎言，口是心非的消极反抗变成了民间应付官方的常态；敢于直面恐怖秩序的良知者也在同步增加，局部性的自发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经令官方的控制和镇压逐渐失效；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政治一元化而社会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相信，由民间的自发行动推动的社会变革，终将导致僵化的政治权力的改变。所以，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

放眼当今世界，民间反抗暴政的方式越来越放弃暴力夺权而转向非暴力反抗，良知不服从运动已经成为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以民间良知对抗恶法恶治更成为独裁国家中的民间反抗运动的常态，民间努力瓦解独裁政权的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已经成功，吉尔吉斯的革命也曙光初现，掌权长达十五年的总统阿卡耶夫流亡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组成临时政府，并宣布六月份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迅速扩张。



中国政法大学2016届毕业致辞：为法治而奋斗

你们是英雄辈出的九零后

——中国政法大学201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致辞 |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昌平是一个童话世界，你们是二零二名精灵。

今天，剧本已翻至末页，互道珍重后，就要离别。

四年的光阴，你们在这里编织青春，回忆历历在目。

晨曦初照时，你走出梅园、兰园、竹园和菊园。宪法大道上的拓荒牛，就像你的兄弟，向你颌首致意；紫藤架下的猫儿，像一群流浪歌手，为你的晨读伴唱。

在厚德殿和明法殿，你遇见讲坛上流派各异的王子、小矮人和侠客，为你讲述法治国的传说，你迷醉其中。

从前，法大有一位诗人叫海子，他曾经在这座礼堂朗诵过他的诗篇。他说：“我要做远方的忠诚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但是，短暂情人没有做成，因为物质匮

松柏林中，钱端升爷爷永远在向你微笑，但你一直没有猜透：他老人家在想什么？

在法渊阁和文渊阁，你与睿智的心灵对话。你掩卷沉思，望着窗外，天空霞光万丈，每一片梧桐树叶都是金色的，正如你梦幻般的青春。

心情忧郁时，你在十三陵水库边漫步，想象末代帝王的悲怆和凄凉，一扫心中的爱恨情愁。

心情欢畅时，你登高军都山，远眺紫禁城，想象三百年前，闯王李自成挥师昌平，沿着你熟悉的345公交

缺；远方也渺茫不见，因为他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他的生命终结在通向远方的铁轨上。他的诗篇和他的宿命，是你父辈那代人曾经的梦想与绝望。

支线的道路，攻入德胜门。

遐想中，你穿越了。你变身成为一名英雄，站在城墙上，向城内的王侯将相宣讲宪政理想，不幸身中暗箭，醒来时，你泪流满面。

显然，你已经患上法大人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症状！恭喜你！你合格毕业了！

这就是你们——可爱的法大九零后的学子们，你们如此地感动我们。

三十年已逝，沧海桑田，成就举世瞩目，国运正在逆。理想国就在前方，但新的大山和陷阱正隐隐地张开狰狞的面孔，体制的惰性无力自拔，时代呼唤英雄。

你们是九零后人。翻开上世纪末的日历，你们出生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正是严冬消退改革复活之时，改革是你们的胎记。之后，你们与互联网共同成长，开放是你们的天性。

你们禀赋独特，会怀疑，会翻墙，会判断，有情怀，有智慧，有见识，人小鬼大，大道无形。无法想象，你们的未来会在上世纪遗留下的枷锁中度过。

一代人的成长节奏与一个国家的成长节奏不期而遇，必将碰撞出灿烂的火光，点燃你们的人生。时势造英雄，九零后人的哲学注定不是幸福哲学，而是英雄哲学。九零后一代，必将英雄辈出！

所谓英雄，首先是心灵的英雄。人生是

一场驾驭心灵与时间的旅程，十之八九是艰辛，幸福不过一二。驾驭者是英雄，被驾驭者必然沉沦。

所谓英雄，是思想的英雄。英雄只向真理低头，思想的英雄不谄媚于权力，也不迎合大众。真理本无所谓左中右，客观理性和民族利益是发现真理的两只眼睛，你们必须向21世纪的中国贡献精纯的思想。

所谓英雄，是行动的英雄，是政治的英雄，正如法大校友榜上的熠熠群星。

在法大校友中，有一种人，他们没有官衔，没有财富，但坚毅地为法治理想战斗，广受爱戴。他们是公民的英雄，是母校的骄傲，是你们的榜样。

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那时，“你在战斗，母校注目；你蒙冤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莫过于此。”

当然，在法大校友中，也有一种人，在社会染缸和国家机器中，随波逐流，迅速堕落。权力在手，肆意滥用，不问法律底线，践踏人权，制造雷洋案式的悲剧，他们是公民的公敌，是母校的耻辱，是你们的对手。

如果有一天，你无力抵御沉沦，沦为鹰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将会喊你回家——去“抄宪法”。，是否在你们身上种下抵御沉沦的基因，这才是你们人生力量的源泉。

同学们，请不要忘记，去年的一个冬

你们禀赋独特，会怀疑，会翻墙，会判断，有情怀，有智慧，有见识，人小鬼大，大道无形。

人生奇幻，奥妙幽深。衡量一个大学教育的成功，不是浅表的知识灌输，最珍贵的是，大学是否在你们心中点燃崇高理想的火焰，是否在你们身上种下抵御沉沦的基因，这才是你们人生力量的源泉。

同学们，请不要忘记，去年的一个冬夜，也是在这座礼堂，江平先生洪钟般

的寄语。他说：“法大学子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他的声音随着雪花，飘进你的心，伴你一生一世，抵御沉沦。

时间是冷酷的推手。在路上，年迈的英雄将一位位离去，年青的英雄将一个个崛起，薪火如斯相传，法治国的城门终将会被打开！

同学们！

你们是英雄辈出的九零后！

我们对你们充满期望！

向你们致敬！

2016年6月28日上午

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礼堂

王涌

发条橙

发

条橙是伦敦土话，形容一个人很怪。后来华纳兄弟公司给了它全新的解释“一只发条橙——表面上看健康完整，但内心已被机器操纵。”

《发条橙》描绘出一个上帝死后等级森严的机械社会，人类的宽容、怜悯连同个体的尊严、人性的光辉消失殆尽。艾力克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叛逆、暴力，没有是非观念，犯罪的冲动在其血脉里蠕动。同《筋疲力尽》中的米歇尔（Michel Poiccard，让-保罗·贝尔蒙多饰）、《雌雄大盗》中的邦妮（Bonnie）与克莱德（Clyde）一样，艾力克斯也是个拥有自毁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米歇尔渴望信任与爱情，邦妮和克莱德是对恩爱的夫妻，两者的人伦情感给观众提供了注入理解与认同的切口。反观艾力克斯，一个未成年人，沾染了嗜权的风气，像他学校的老师一样将自己的冷漠、暴戾、权威强加在三个伙伴身上。当同伴要求平等时，艾力克斯用手杖敲击了他们的下体、用刀割破了一个同伴的手背，惩罚了他们对领袖的忤逆。从这点来讲，也许可以认为艾力克斯是不公正社会的牺牲品，扩大来讲任何罪犯都可认定是被社会掳害，这种绝对合理的话显然不能说明一切、不能让人心安理得。



除却嗜权的社会影响，艾力克斯体内的恶却没有缘由的，他与同伴群殴流浪汉，随后又潜入作家别墅里、将作家殴打致残，又当着他的面轮奸其妻子，就在这段戏里，艾力克斯唱起了《雨中曲》。在大部分以性格有缺陷的人物为主角的电影中，观众通常会认同角色的暴力或者其他犯罪行为，《出租车司机》里德尼罗枪杀皮条客会让人大呼过瘾，《沉默的羔羊》里“食人魔”汉尼拔成功越狱也能给人快慰。而《发条橙》中的暴力场面根本没有给理解留下入口，艾力克斯的强奸如同纳粹对普通人群的机枪扫射，践踏了人类的尊严。

警察、法庭与监狱，暴力机构的制裁并不能撬动艾力克斯本性中的恶，也不能抵消被害者追求对等惩罚的复仇心理，暴力机构无用性的困境显露无疑。接受治疗出狱后的艾力克斯，暴力的念头依然在其体内流动，只不过丧失施暴能力的他看上去不再有害。先是被父母抛弃，接着是被一群流浪汉殴打，更加讽刺的是，他昔日的恶棍同伴当上了警察，水淹棒打中艾力克斯求饶的声音与被他施暴的对象何其相似。



《发条橙》剧照

虚弱的艾力克斯鬼使神差的爬到了作家的别墅，秃头作家自然不会放过复仇的机会，艾力克斯被关进了顶楼，楼上传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令他痛不欲生。施暴人变成了被施暴的对象，在这对立身份的转变中，艾力克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反思自己的暴力行为，流浪汉、昔日同伴与作家也没有展现过一丝的宽容。没有悔过自赎，没有仁慈宽容，使得双方表现出相似地丑陋，两者皆丧失了成为被同情者的可能。



“我们身上原罪深重，反而认为恶很诱人，破坏比创造更加容易，更加壮观。……我的讥讽小书竟吸引了许多人，因为它就像一筐坏蛋，散发着原罪般的臭气。”电影出来后，他却要连库布里克都要恨了。“影片的主旨对人的自由意识提出了置疑。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固定的方式和原则生活。当选择做好人或坏人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人们是否还真正享有人权？”库布里克这种对自由意志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思考固然直透本质，却忘记了他的观众是孱弱而平庸的，他们会打着《发条橙》的旗号杀人作案。在伯吉斯看来，库布里克或许该像伯格曼、费里尼等人那样承担起人类的道德责任，但他却过于冷漠和嘲弄地看着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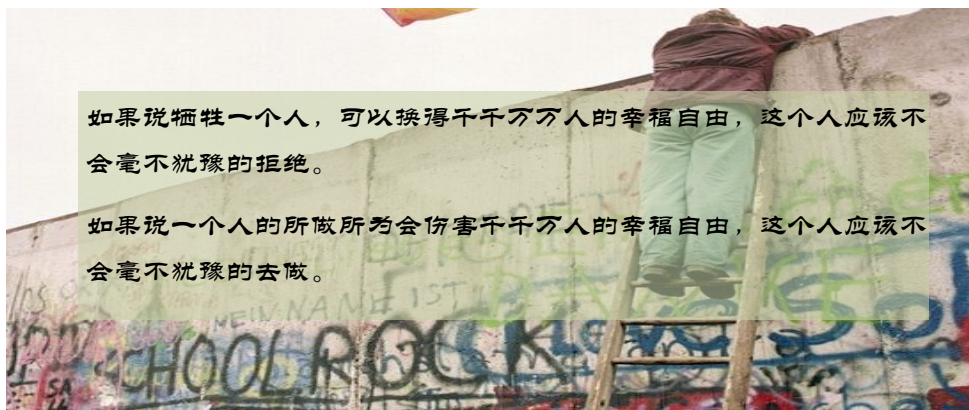
台词精选

——我要我剩下的人生能充满着良善

——问题是这个技术是否真能让人向善。善良是来自心中，善良是种选择，当一个人无法选择，他也不再为人。

——这年轻的男孩就是这残暴提案活生生的证人。人民，一般大众，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自由的传统需要捍卫，自由传统即是一切。一般大众会让它通过，对的。他们会为了更安宁的生活而出卖自由，所以他们必需被引导、被驱使、被推动。

从现实的墙到无形的墙：一位程序员的翻墙感悟



作为一个程序员，小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上网（玩游戏）。

那时候都是去网吧，初中的时候，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对事物的向往总能给予我们莫大的勇气，我和朋友们于是夜里偷偷摸摸翻墙去上网。

翻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的墙很高，而且晚上没有什么光，好在有时候月色正好。

天晚上月光皎洁，我们都想去上网，当时第一次和三个朋友决定翻墙去上网，其中一个朋友是河南少林寺还俗弟子，在少林寺积累下了丰富的翻墙经验，

同时也因被发现翻墙挨罚（一根竹鞭打断）成就了超出同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他说他来探路，他踩在一个朋友身上，爬到了墙上，然后，一个踩在另一个身上出去，我是最后一个，

我在墙角利用两面墙爬了上去。我们四个就站在了墙上，那时候我的内心愉悦快乐紧张害怕，学校周围有些破旧废弃的房子和一些居民，我们都不知道墙下是什么样子，在墙角利用两面墙爬了上去。我们四个就站在了墙上，那时候我的内心愉悦快乐紧张害怕，学校周围有些破旧废弃的房子和一些居民，我们都不知道墙下是什么样子。

有多高，还俗弟子朋友，当仁不让的决定直接跳下去试试。他跳下去的声响很大，因为真的很高，墙的两面距地面不是一样高。声响大到惊动了那条街所有的狗，

伴随着还俗弟子朋友着急喊着的，不要跳，太高了，还在墙上的我们三个肯定听出来不能跳了。过了一会狗们安静了，我们也没想出比直接跳下去更好的办法。

于是决定都直接跳下去，我第二个跳的，咚，一声，满街狗吠，咚，咚，四个人都跳了下来。然后一起跑出了那条街，直到看到光线，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满是狗叫声的街。

之后翻墙，在我们班，在整个年级开始流行，也开始有人被抓，但我们那一届学生翻墙从未停止过，尽管被开除的有好几个。现在那学校发展的不错，墙更高了，还装上了摄像头监控。

在那学校翻墙去上网应该绝迹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我还要翻墙上网，墙也

从曾经那摸得到的墙，变成了现在这摸不到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墙。

原来我从来没有从那个月色皎洁的夜晚走出来，我还要爬上墙，还要跳下来，还要害怕被抓，还要对所处环境的不满无可奈何（还要推广翻墙事业）。

我特别担心有一天，我们像身处高墙内被摄像头监控的学生一样，失去翻墙的勇气。

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高墙，在于信息的阻塞，信息的虚假。信息时代的墙，程序员首当其冲，

所以我们翻墙，不止翻墙去获取信息，更是去交流，和国内的同行交接，和国外同行交流。

我一直认为在国内我们大家之间也有墙，一道我们恐惧害怕习惯维护的墙，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说自由，我们不说民主，我们不说公正，我们不说法治。

言论的管制，程序员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现在程序员也应该是颠覆者，改变这个困境，消灭这些让大家都痛苦的墙。

程序员，无论技术高深，还是学艺不精，都能成为我们共同的自由世界的开拓者，守护者。我知道有很多前辈在为此做努力，我会紧随其后。

而且，程序员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加上不怕死的精神，一个大家所期望美好的世界就一定能实现。

程序员缺少的可能是时间和战斗欲望，只要大家认真观察下所处的环境，这就都不是问题，大家会发现自己可以改变的事物很多，

所作所为也是相辅相成，注意自身安全和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做一些可以让大家都生活的更轻松点的事。就算没人知道，历史不会记载，我们自己做自己的见证人。

正义不曾存在，正义也不会消失，有你有我，就不会断层，就不会让期待的人失望。大家对程序员的期望就是程序员维护正义的必要性。

网络隐私安全小知识

gledos道歉者

DNS泄漏

DNS泄漏是一个翻墙的安全漏洞，如果处理不得当或者默认情况，你的 DNS 请求会发给 ISP（网络服务提供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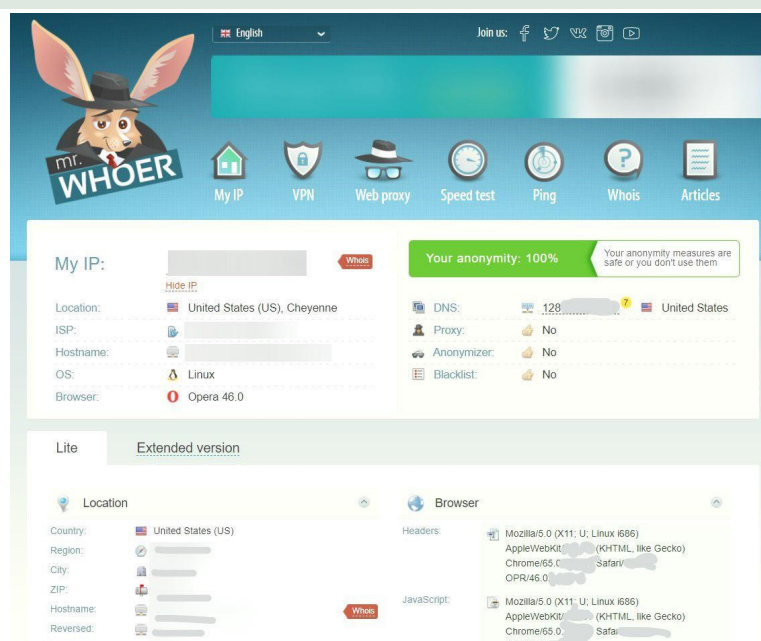
这样 ISP 就会得知你在上什么网站，如果 ISP 拿到太多的访问日志，他们也许能推测出你的推特账号之类的。

原理：DNS 请求没有经过 VPN、SS 等隧道，或者手动设置的 境外DNS 被 ISP 劫持了。

测试：打开 dnsleaktest.com 进行测试以验证你的 DNS 请求是否没有泄露。

解决办法：DNSCrypt 可以通过 http/https 来查询 DNS，SS 就能代理 DNS 请求了。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这里就不探讨了。

作业：打开 whoer.net 看看你还有什么地方暴露了你的真实信息，比如时区、语言 以及其他渠道中你的 IP 地址。（whoer.net 中的得分仅供参考，没有安全价值）



账号密码管理

密码是一个麻烦的东西，如果各个账号使用的密码相同，风险是很大的，如果想要让每个账号的密码都不同，可能记忆、保存起来不是很方便。

好消息是有至少数十个常见的密码管理工具来帮助你，不过应该排除掉商业性不开源的软件。

KeePass 不错，多种插件支持，随机密码的效果算挺强的，文件的格式是数据库，可以放各种格式的文件进去，只是移动版大多不支持插件。

还有一些是以主密码+网站+用户名来产生你独一无二的密码，，比如 Master Password。

不过软件是小事，设置密码的习惯要足够重视。想知道你的密码泄露了吗？打开 haveibeenpwned.com

这个网站并输入你的邮箱，就会在公开的账号库中查找是否有你的数据，祝你好运。

（此网站作用有限，仅供参考。1Password是商业闭源软件，不推荐使用）